

正 / 面 / 战 / 场 / 抗 / 战 / 启 / 示 / 录

长沙会战

邢 焯 许海芸 编著

依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史料

民国档案与民国史专家**马振犊**

领衔担纲

航空工业出版社

长沙会战

邢 烨 许海芸 / 编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介绍了抗日战争期间，中日双方以长沙为中心的激烈的攻防战。古城长沙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第九战区非常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出动了重兵与侵华日军对峙，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利用长沙附近的山水地貌，在前两次会战过程中不断修正作战方案，逐渐形成“天炉战法”，终于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取得了明显的胜利。本书适于广大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沙会战 / 邢焯, 许海芸编著. --北京: 航空工业出版社, 2016.7

(正面战场抗战启示录)

ISBN 978 - 7 - 5165 - 1031 - 5

I. ①长… II. ①邢… ②许… III. ①长沙会战—史料 IV. ①K265.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2531号

长沙会战

Changsha Huizhan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2号院 100012)

发行部电话: 010 - 84936597 010 - 84936343

三河市华骏印务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3.75

字数: 180千字

印数: 1—4000

定价: 40.00元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序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研究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两大主要内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史学界关于抗战正面战场研究从无到有、从略到详，经过30余年的努力，除整理出版了大批有关历史资料外，还出版发表了大批的专著和论文。总体上看，这段历史已经做到全局展现，史实清楚。有关研究工作正在向评价的客观化、论述的精细化、考据的准确化方向发展。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民族，全面投入了神圣的抗日救国战争，与日本侵略者开展了浴血奋战。其中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负责了正面战场上对日军的作战。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与战略上指明了抗战的路线与方向，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担负了敌后战场对日伪军的作战，抗击了全部的伪军及战争后期的大部分日军，发挥了中国抗战中流砥柱的坚强作用。因此，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对日抗战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是中华民族捍卫独立自由、争取民族复兴的开始。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荣光，值得全民族永远纪念与珍惜。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才能保证我们民族付出巨大

牺牲代价而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至受到轻辱，民族根本利益不至因内部矛盾被人利用而受损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东方主战场的国际地位和应有的历史评价不至丧失。

正面战场的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它是中日两支不同水平层次军队的正式较量，中国军队依靠正确的战略和官兵们惨烈的牺牲，在盟军合作下最后勉力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有许多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正面战场的抗战结果称之为“惨胜”，是十分生动而贴切的。而就中国抗战的全局而言，抗日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抗战的胜利是伟大而光荣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智慧、毅力和勇气将万世留芳。

为回顾历史，缅怀先烈，中航出版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与本丛书编写组策划撰著了九卷本《正面战场抗战启示录》，依据民国历史档案，体现最新研究成果，全景式再现中国抗战正面战场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历史过程，以警惕日本军国主义亡灵复活，珍惜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关于正面战场抗战史的全面记载及全新评述，是本套丛书的特点。自1937年到1945年，发生在抗战正面战场的各主要战役，其起因、发展经过与结局，不仅出自敌我双方的军事性战术性因素，而且具有更广泛深刻的战略原因，甚至具有超越军事因素以外的政治、经济、外交、国际战略关系等因素。回顾整个抗战正面战场的作战历史，厘清上述问题是一项很有意义但也很复杂的工作，但也正是本丛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本丛书作者群为抗战史研究领域的档案工作者及史学研究与教学者，对相关历史资料及研究状况较为熟悉，兼具一定研究心得，为本丛书撰著

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由于本丛书作者均是长期从事于民国档案与民国历史编研教学的专业人士，因专业范围所限，对抗战正面战场作战史较为熟悉，并不涉及对于抗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关系及两者战略地位的评价。我们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肯定正面战场上中国将士英勇奋战牺牲卫国的同时，我们也试图对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在抗战中从战略到战术指挥中的成功以及失误与弊端进行全面的分析与公允的评价。

丛书由本人担任主编，杨智友任执行主编，袁炜、薛立若任副主编及策划，学术顾问由郭必强担任。丛书共分9册，以发生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22次大战役为描述内容，以“会战”与“战役”为专题，分别为“太原会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滇缅会战”“豫湘桂会战”和“湘西会战”，以此构成对抗战正面战场的整体描述。

马振犊

2016年6月30日

目录

重要人物表 / 1

第一章 战争前夜的湖南 / 5

抗战抵御 / 6

欧战爆发 / 15

第二章 焦土长沙 / 19

襟要之地 / 20

“焦土抗战”下的长沙 / 23

薛岳入主湖南 / 33

第三章 一战长沙：湘北迷雾 / 41

日本的企图 / 42

薛岳抗命守长沙 / 48

湘北大战 / 55

大捷从何而来 / 62

第四章 重整和建设 / 73

薛岳治湘 / 74

日本神秘的“桐工作” / 96

第五章 二战长沙：如此“大捷” / 107

德国入侵苏联 / 108

“加号作战” / 111

众人期望的“大捷”背后 / 124

第六章 三战长沙：岳麓怒火 / 137

阿南的心思 / 138

“天炉战法”的最终形成 / 144

三战长沙 / 152

祝捷 / 169

第七章 功过是非历史定 / 181

附录

《天炉战》 / 188

指挥系统表 / 206

重要人物表

中方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浙江奉化人，名中正，字介石。近代著名政治人物，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华民国总统等职。

薛岳（1896年12月27日—1998年5月3日），广东省韶关人，原名薛仰岳，字伯陵。国民革命军著名军事将领，指挥了万家岭大捷、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被认为“是抗战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

罗卓英（1896年3月19日—1961年11月6日），广东大埔县人，字尤青。国民革命军著名军事将领，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曾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

李宗仁（1891年8月13日—1969年1月30日），广西桂林人，字德邻。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他在北伐前致力两广统一，奠定了北伐的基础。在抗日战争中曾指挥徐海会战，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广西桂林人，字健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是桂系中心人物，他多谋善断，在国民党将领中素有小诸葛的称号。与李宗仁合称李白，在抗战时期合作指挥抗战，多有胜果。

张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6日），安徽巢县（今巢湖）人，字文白。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在抗战初期曾任湖南省主席，后因长沙大火被革职。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后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被称为“和平将军”。

陈诚（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浙江丽水人，字辞修。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也是黄埔军校成立之后蒋介石的重要心腹。抗战时期曾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主政台湾期间，陈诚在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皆有政绩。

杨森（1884年2月20日—1977年5月15日），四川广安市人，字子惠。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曾任贵州省主席。他一生多具传奇色彩，历经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内战等。

王陵基（1883年—1967年），四川省乐山人，字方舟。是川军中资格最老的将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国民革命军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

王耀武（1883年—1967年），山东泰安人，字佐民。毕业于黄埔军校，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军长、第四方面司令官等职。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被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李玉堂（1899年2月7日—1951年2月5日），山东广饶人，自瑶阶。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与李延年、李仙洲、王耀武合称三李一

王。长沙会战中，李玉堂率部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后李玉堂被迫认为革命烈士。

日方

近卫文麿（1891年10月12日—1945年12月16日），日本前首相，他在其任内推行了严密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对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向国民政府提出苛刻条件，发表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同时与德、意签订《三国轴心协定》，扩大对亚洲其他各国的侵略。

畑俊六（1879年7月26日—1962年5月10日），旧日本帝国最后一个受封元帅的陆军大将。1938年任侵华日军华中日军司令官，指挥攻占武汉的作战。1939年任陆军大臣，1941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是欠中国人民血债最多的日本大将之一。

冈村宁次（1884年5月15日—1966年9月2日），日本陆军大将，“九一八”事变后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参加侵华战争，1944年升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

阿南惟几（1887年2月21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陆军大将。作为日军第十一军司令指挥了两次长沙会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因轻敌冒进，两个师团在长沙城下被国军围攻，苦战之后才获逃脱。1945年8月15日，因拒绝投降而自杀。

第一章

战争前夜的湖南

1

抗战抵御

1937年7月7日，枪声划破了北平城外卢沟桥静谧的夜空，日方假借士兵的“失踪”，再次挑起了与中国的矛盾。这次，中国守军未再退让。8日清晨5时左右，受到日方的炮击后，中国第二十九军司令部立即动员前线官兵积极反抗，“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提出“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当时日军气焰嚣张，叫嚣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在日本国内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有“四个要地”——平津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带、珠江三角洲地区和武汉三镇，“如能控制其中三个地区，就能控制中国的大局^①。”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日本侵略者的一场迷梦。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在河北、山西等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937年8月13日，战火又燃及中国东南沿海经济最发达的地区。10月下旬，上海战事日益吃紧，同时日军飞机频频对首都南京展开轰炸，南京所受威胁日趋严重。面对日本侵略者“积极西犯，图袭我首都，迫订城下之盟^②”的阴谋，为了“贯彻持久抗战之主旨^③”，国民政府决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的驻地，迁都重庆。

1937年11月16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做了《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告知与会者：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同日，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职员，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开始陆续离开南京赴武汉集中。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府直属的

①[日]秋定鹤造：《东条英机——东条生平和日本陆军兴亡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8页。

②《蒋介石1937年11月26日对外籍记者之谈话》，（台北）《近代中国》第18辑，1980年8月。

③《蒋介石1937年11月致四川省政府电》，重庆《国民公报》1937年11月24日。

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乘“永丰舰”启碇西上。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并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言称^①：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迺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重庆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也表现了国民政府坚持持久抗战的决心。

迁都重庆，是为了不做城下之盟，坚持长期抗战，挽救民族危亡、收复沦丧国土、赢得最终胜利的，因此国民政府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拥护与坚决支持。自《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发表后，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发表有关拥护迁都、支持抗战的函电。1937年11月20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率先发出拥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文电，内称：“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敌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算终自我操。不特可得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7000万人，翘首欢迎。”^②24日，中国国民党广九铁路特别党部、广九铁路员工抗敌后援会、广九铁路工会及全体员工联合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称：“恭聆宣言，益感兴奋，誓率全路员工竭诚拥戴，愿以热血为政府抗敌

①《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四川省政府公报》第100期。

②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下），（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31页。

后援。^①”25日，汕头市救亡会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称：“夫中枢为全国首脑，统筹全局，策划于帷幄之中；指挥作战，决胜于千里之外，用持久作战之略，收聚敌而歼之功。外得国际之同情，内坚国民之团结。职会誓率汕头民众，服从政府令，参加抗敌工作。^②”民众也对迁都和坚持抗战表现出了坚定的支持。26日，刚迁至重庆不久的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称：“兹者，国府移渝，得高屋建瓴之势，收统筹指挥之功，中枢益固，士气弥坚。长期抗战之决心，昭示无疑，民族复兴之伟业，不难成就。本会全体学生，除竭诚拥护此举外，本国家育民储材之旨，各尽所能，效忠党国，依中枢御侮之策，磨砺以须，光复中华。^③”

对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重大影响和积极意义，当时全国舆论界颇具影响的《大公报》在一篇题为《恭读国府宣言》的社评中称：“此一纸宣言，足以抵百万生力军。因为自失太原、退淞沪，接着敌军一面攻济南，一面攻苏嘉，一部分人心中不免有忧郁的暗影。而这个宣言发表后，顿时把这个忧郁一扫而空，全国士气之振奋，人心之感激，有不可以言语形容的。^④”重庆《国民公报》则评论说：“（宣言）不啻对当前抗战局势做一重大说明。政府早有坚强之决策，士卒益增其必死之决心，大势无论如何，复兴民族之神圣使命，终可达到。^⑤”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仅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威迫我国都，要挟国民政府做城下之盟，不战或速战而迫使中国屈服的迷梦，还显示了国民政府在华北、淞沪战事失利的情况下，移师再战，坚持抵抗侵略的决心，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抗日信念，鼓舞了抗日士气。此后，国民政府开始了“持久战”战略的实施。正如蒋介石所言：“虽然前方军事或有

①《中国国民党广九铁路特别党部等为欢迎国民政府移渝办公事致国民党中央党部电》（1937年11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下简称二史馆）馆藏档案：—（1）/797。

②《汕头市救亡会为欢迎国民政府移渝办公事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电》，二史馆馆藏档案：—（1）/797。

③重庆《国民公报》1937年11月26日。

④《大公报》1937年11月21日。

⑤重庆《国民公报》1937年11月23日。

局部的失利，只要国府在，必与之抵抗到底。^①”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能得到西方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全力援助，然而未能如愿。当时西方主要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日本采取了绥靖妥协政策。时任法国外交部秘书长的莱热曾表示：“欧洲局势是压倒一切的大问题，而宁愿无视法国在远东的利益。^②”他们认为最好对日本采取安抚政策，尽最大努力避免与其发生冲突，并尽量引导日本向北进攻苏联，从而减轻英法在欧洲的压力。1939年初，西方舆论界鼓吹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英国一再表示，承认长江以北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示意国民政府提出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企图以牺牲中国，换取与日本的妥协。

对于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蒋介石尽管不满，但他认为日本的侵略直接损害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日本一定会与列强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英美等国的政策一定会发生变化。他认为：“虽然与他（日本）冲突最厉害的英、美、法、俄各国，目前都没有参加战争，与我们共同一致来打击日本，但这不是国际不动，而是时机不到。”日本“时刻陷在危险的深渊。一有失利，或一旦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各国就会毫不迟疑地加以打击^③”。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虽然武汉会战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是失利的，但在战略上并未完全失败。首先，武汉会战消耗了日军大量的兵力、物力，达到了一定程度上持久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其次，尽管日军攻下了武汉，但其作战计划并未实现，它没能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彻底破产。为此，日本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以有限的兵力“确保占领区”“彻底击灭抗日之国

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4年编印，第656页。

②《顾维钧回忆录》（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8-439页。

③《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第111页。